

普通高校英语类专业学生语法/语用能力调查研究

杨咏婷

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83

【摘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普通高校英语类专业学生的语法与语用能力发展状况。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整体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高年级与低年级学生之间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且差异幅度有限。然而，语法能力与语用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现有课程体系未能有效促进学生能力的阶梯式发展。本文建议构建融合语法与语用的教学模式，以促进学生语言综合能力的协同提升。

【关键词】：语法能力；语用能力；英语专业学生；调查

DOI:10.12417/2705-1358.25.23.080

语言学习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有效交际，这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要达成此目标，学习者必须具备扎实的语法能力以生成形式正确的句子，同时还掌握得体的语用能力以在特定语境中理解和使用这些句子。正如应用语言学家 Bachman 所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所示，语法能力与语用能力是构成个体语言交际能力的两个不可或缺且相互关联的维度（Bachman, 1990）。同样，Celece-Murcia 等人也强调，将语法教学与语用意识培养相结合，是提升学习者整体语言水平和交际效果的关键（Celece-Murcia, Dörnyei, & Thurrell, 1995）。因此，对二者进行协同考察，是评估外语教学质量与学习者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尽管语法与语用能力的关系在理论上密不可分，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存在分歧，这表明二者的具体关联仍有待深入探索。部分研究发现，语法和语用能力发展不平衡，例如，Bardovi-Harlig 和 Dörnyei 的研究揭示了二语学习者的语法能力可能先于语用能力发展，导致他们（尤其是 EFL 学习者）更关注语法错误而忽视语用错误（Bardovi-Harlig & Dörnyei, 1998）。也有研究指出了熟练掌握语用能力意味着真正掌握了一门二语或外语，因为语用能力可被视为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最高或进阶层次（Kasper & Rose, 2002）。在国内研究语境下，学者们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有研究认为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学习者语用能力显著高于其语法能力（夏宝兰&彭庆华，2011），而另一些则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水平落后于其语言水平（周秀敏，2013；李燕&姜占好，2014）。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凸显了在不同教学环境与学生群体中对此问题进行持续验证的必要性。本研究旨在回应这一需求，聚焦于

中国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对其语法与语用能力现状及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探究。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主要问题：

- 1.普通高校英语类专业学生的语法及语用能力如何？
- 2.高、低年级学生在语法与语用能力上是否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 3.学生的语法能力与语用能力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1.2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广东省某民办高校英语类专业（包括英语与翻译专业）的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由于三年级学生已经完成了两年的专业课程学习，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一年级学生视为低年级组，三年级学生视为高年级组。

1.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学生的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进行评估。语法能力测试问卷的设计参考了白丽茹（2015）编制的量表框架（包括句子监控技能和句子操作技能两个主要维度）。题目选择和编写基于《牛津英语语法系列》（2021年版），并结合该教材中的核心语法知识点，以确保题目的权威性和针对性。

作者简介：杨咏婷（1991—），女，汉族，广东省龙川县人，广东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课题项目：广东科技学院人文社科项目(XJ2022021902)。

语用能力测试问卷的设计参考了何自然和陈新仁（2004）在《当代语用学》中的理论框架，以及赵菲菲（2006）在其硕士论文《语用能力与大学英语教学》中提出的测试方法。测试内容包括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两个部分，各占50%。具体题目涉及日常交流场景，旨在考察学生在实际沟通中的语用表现。测试题目在选择时，结合了生活化话题，并作了适度调整，以便更好地符合当前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

1.4 数据收集

调查问卷由作者在同一周内分两次在课堂上发放，事先告知学生该问卷结果将作为课程评估的一部分，以确保学生认真对待。共发放78份问卷，回收71份。在回收的问卷中，经过严格筛选后，有效问卷共61份。无效问卷主要因缺失大量数据或题目空白较多而被排除。问卷评分由作者根据预设评分标准进行，所有分数录入至Excel表格中，整理完毕后，数据导入SPSS Statistic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总体习得情况

本研究采用百分制计分，以50-70分为中等水平参照。在语法能力层面，学生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低年级组语法总能力均值为54.73（标准差=19.100），高年级组为60.94（标准差=14.622）。高年级组得分的离散度低于低年级组，表明其语法能力分布更为集中，个体差异缩小。

在语用能力方面，学生整体表现有两大特点：社交语用能力优于语言语用能力，且低年级至高年级的提升幅度有限。语用总得分从低年级组的53.87（SD=15.303）上升至高年级组的58.39（SD=13.812），处于中等水平。社交语用能力（满分50）得分较高，低年级组均值为30.33（60.7%），高年级组为31.68（63.4%），且高年级组标准差较小（5.062），表明高年级学生表现更加集中。相比之下，语言语用能力得分较低，低年级组均值为23.53（47.1%），高年级组为26.71（53.4%），但仍未达到及格的标准，反映出学生在语用语言形式选择上存在明显不足。

上述结果表明，学生的语法与语用能力虽随年级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不容乐观，未能达到预期的高度。特别是语用能力中语言语用的薄弱，提示教学中对显性语用知识（如言语行为规则、会话含义等）的培养可能存在不足。高年级组标准差降低的趋势，则可能反映了教学方法的趋同或学习经历整合的效果。

2.2 年级差异

为检验高低年级学生语法与语用能力的差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 $\alpha=.05$ ）。描述性统计显示，高年级

组在语法能力（ $M=60.94$, $SD=14.622$ ）和语用能力（ $M=58.39$, $SD=13.812$ ）上的均值均高于低年级组（语法： $M=54.73$, $SD=19.100$ ；语用： $M=53.87$, $SD=15.303$ ）。

t检验结果表明，语法能力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t(54.329)=1.421$, $p=.161$ ；语用能力差异亦不显著， $t(59)=1.212$, $p=.230$ 。语法能力的Levene检验显示参差不齐（ $F=6.267$, $p=.015$ ），故此处报告了校正自由度的t检验结果。尽管语用能力数据经K-S检验显示偏离正态分布（ $z=2.15$, $p=.002$ ），但鉴于t检验对正态性假设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且本研究样本量尚可，故仍采用t检验作为主要分析方法。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曼-惠特尼U检验结果同样不显著（语法： $U=389.50$, $p=.276$ ；语用： $U=381.00$, $p=.225$ ），与t检验结论一致。为评估差异的实际幅度，本研究计算了Cohen's d值，语法能力与语用能力的效应量分别为0.341与0.310，均属小效应量。

综上，高低年级学生在语法和语用能力上既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其差异的实际幅度也较小。该结果可能与两方面因素相关：一是低年级刚完成高中系统语法与基础知识学习，对核心能力的掌握已具备一定基础；二是高年级教学中语法与语用能力的训练未形成系统性的、循序渐进的提升路径，导致能力增长幅度有限，未能形成显著的年级差异。

2.3 相关性

由于语用能力得分经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单样本K-S检验， $p<.05$ ），故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法，检验水准 α 设为0.01。斯皮尔曼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生的语法能力与语用能力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 $r_s(59)=.926$, $p<.001$ 。根据统计学标准（ $r_s \geq .80$ 表示极强相关），本研究中语法能力可以解释语用能力绝大部分的变异，二者关联强度高。

这一强有力的正向关联支持了二语习得领域中语法能力是语用能力发展基础的这一观点。扎实的语法知识很可能为语言的理解与产出提供了必要的结构基础，从而使学习者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语用判断与表达。尽管这种高度相关也暗示了二者在教学中可能协同发展，但必须指出，相关关系本身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这种极强的关联性提示我们，在教学中将语法知识与语用情境深度融合，可能比孤立地培养任何一种能力更为有效。

3 结语

综上所述，学生的语法与语用能力整体仅处于中等乃至偏下水平，且高、低年级之间并未形成统计学上显著的差距。然而，研究揭示出学生的语法能力与语用能力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尽管目前的课程体系未能有效推动学生能力随年级实现阶梯式增长，但语法与语用能力的协同发

展关系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结论呼吁在教学实践中,打破语法与语用教学的壁垒,设计融合二者的一体化课程,这或许是突破当前学生能力瓶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路径。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尚未深入探讨影响两种能力关系的内在机制,

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相关变量进行机制分析,并通过扩大样本范围与院校类型,对本文结论的普适性作更广泛的验证。

参考文献:

- [1] Bachman,L.F.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 [2] Bardovi-Harlig,K.,&Dörnyei,Z.Do language learners recognize pragmatic violations?Pragmatic versus grammatical awareness in instructed L2 learning[J].TESOL Quarterly,1998,32(2):233-259.
- [3] Celece-Murcia,M.,Dörnyei,Z.,&Thurrell,S.Communicative competence:A pedagogically motivated model with content specifications[J].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1995,6(2):5-35.
- [4] Kasper,G.,&Rose,K.R.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2002.
- [5] 白丽茹.英语专业学习者英语语法能力量表编制[J].外语界,2015,(05):42-51+78.
- [6]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7] 李燕,姜占好.新时期英语专业学生语用能力调查报告及启示[J].外语教学,2014,35(5):68-71.
- [8] 夏宝兰,彭庆华.语法/语用能力及其意识程度调查研究——以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为例[J].宜宾学院学报,2011,11(01):72-75.
- [9] 赵菲菲.语用能力与大学英语教学[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
- [10] 周秀敏.英语专业学生语用能力调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11):120-123.